

學術對談

## 中國大陸傳播的教學與研究

對談人：朱立、王彥

統稿：王彥



朱立教授  
(Prof. Leonard L. Chu)

「中國大陸是個快速變遷的社會，傳播是變遷的指標，也是變遷的觸媒，重要、有趣、複雜，對於整個傳播研究很有意義和價值，何況還可幫助我們瞭解中國大陸和自己的社會。因此，我覺得非常值得研究。

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想教學模式是不應該存在的，我教兩岸三地傳媒，是從社會學入手，因為傳媒和社會不可分，兩者相互影響。此外，我不會採取本位立場，只提出框架，讓同學自己比

---

王彥，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傳播思想史、政治傳播、新聞教育。電郵：[talktowangyan@gmail.com](mailto:talktowangyan@gmail.com)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5期(2018)

較，而獲致結論。換言之，這門課不是灌輸，而是啟發思考和興趣，因為兩岸三地的傳媒是龐雜的、動態的，無論如何都教不完、學不完，只有興趣和思考才能保證永續學習。

我的課主要是從意識形態、結構和運作三方面去比較三地傳媒的常與變，這種想法很有挑戰性，非常有趣，也比記憶細節有意義。此外，我還鼓勵同學留意通俗文化，通俗文化比新聞影響還大，不應該忽略。」

---

Dialogue

##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Communi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Discussants: Leonard L. CHU, Yan WANG

Editor: Yan WANG

---

### Abstract

This exchange summarizes decades of Leonard L. Chu's reflections on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communi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Chu, who is a veteran educator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s professor emeritus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Taiwan. Chu's family background epitomizes many in contemporary China. Known for his grasp of comparative media system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in Mainland China, Chu has taught at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Australia and Taiwan for 40 years. His numerous publications on education in Chinese media and journalism have influenced many young communication scholars in the pan-Chinese region. In 2012, Chu's contributions to this field won him the fourth Master Hsing Yu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ward. For the Chinese Communication Society's annual convention in 2016, Chu organized a panel entitled Teaching Mainland China Media at Overseas Universities. At the panel, he ruled 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universally applicable model for course organizers although he revealed that he used a socio-historical approach. Quoting communication doyen Wilbur Schramm and pioneer psychologist Lewin Kurt, Chu stated that he is convinced of the practical benefits of theory. Indeed, he said that he encourages his students to apply theory in organizing the myriad of information about China's media, which is scattered among various academic disciplines.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Wang, Y. (Ed). (2018).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communi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5, 1–18.

---

Yan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y,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Ph.D. Candidat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Research interests: communication theory history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5期(2018)

## 朱立簡介

朱立教授，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學士、政治大學新聞學碩士、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新聞學碩士及博士，先後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1975–1991)、澳洲昆士蘭大學(1991–1994)、香港浸會大學(1995–2006)及台灣政治大學(2006–2013)，曾任系主任與院長達十三年，2013年春退休後受聘為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名譽教授。

朱立曾任國際中華傳播學會第二任會長(1994–1996)，香港新聞評議會執行委員、副主席(2001–2006)，以及多種中英文期刊的編輯顧問或專輯客座主編，所獲榮譽包括美國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榮譽學會會員(1982–)、英國劍橋大學沃福森學院訪問院士(Fellow)(Easter, 2004)、台灣地區「星雲真善美新聞教育貢獻獎」(2012)、澳洲昆士蘭大學新聞系榮譽教授等。朱立的研究專長和授課領域涵蓋傳播理論、比較傳媒制度、國際傳播、以及中共新聞傳播制度，著、編、譯十多部專書和六十餘篇論文。

LC：朱立

YW：王彥

### 「我的家族史濃縮了中國近代史」

YW：朱老師，您好。謝謝您接受訪問！我還記得第一次見到您是在**2012年10月的杭州**，您在浙江工業大學的專場講座上，那時我還是新教員。

LC：記得我當時的講題是《怎麼對待大師？》，講宣偉伯教授(Wilbur Schramm，又譯「威爾伯·施拉姆」)的經歷和逸聞，宣偉伯是美國大眾傳播學門的開山大師，是我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結識和熟知的，那時我在美國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傳播研究所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對吧？

**YW :**沒錯。您那次也提到恩師朱謙教授和其他西方學者。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歐美傳播學界，華人留學不如今日普遍，華人師生也不像今天這樣多吧？

**LC :**是的，在當時，攻讀新聞傳播的華人學生很少，但和華人及美國教授關係非常融洽。朱謙教授是宣偉伯教授在史丹福大學的得意門生，是我在南伊利諾大學求學時的老師，也是我在東西方研究中心傳播研究所任「研究見習」(Research Intern)時的導師。大眾傳播學的理論不少源於社會學或和其有密切關聯，但許多院系這方面的課程似乎欠缺，在我所接觸的學者中，唯一開過這類課的是朱謙教授，對我認識傳播的過程和概念非常有幫助。朱謙教授介紹我們學習Talcott Parsons、George Herbert Mead、George C. Homans、Robert K. Merton、Charles C. Cooley、Robert E. Park等社會學大師的理論，啟發我認識社會學與傳播學的重要關聯。我最早的副修是國際關係，因為我想當新聞特派員，後來則轉向副修社會學，這全係朱老師的影響。他對我的學術啟迪很多，還先後推介我到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傳播研究所及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工作。在東西方中心，除宣偉伯教授外，我還認識了冷納(Daniel Lerner)、羅傑斯(Everett Rogers)、柴菲(Steven Chaffee)等優秀學者，他們不僅研究成果傑出，對學術社群的服務和貢獻也良多。

**YW :**您生於大陸，成長於台灣，深造於美國，立業於香港，出走於澳洲，回歸於香港和台灣，如今又定居澳洲。這一路走來可堪稱中國近現代史的縮影？

**LC :**我生於戰亂，長於憂患，我們家的經歷可說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爸爸曾是湖北宜昌霧渡河小學的校長，因對日抗戰而投筆從戎，於1950年隨國軍去台灣。不久，六歲的我與家人飄洋過海，中途棲身香港九龍黃大仙難民區，最終與父在台團聚，卻與羈留大陸的姑姑、叔叔天各一方半世紀。姑姑十幾歲就離開家，參加抗敵宣傳，後來成為北京戲劇學校的老師。對日抗戰時，我叔叔供職於滇緬公路運輸大隊，在「三反」、「五反」時自殺身亡。叔叔的孩子，我的堂弟後來幹上長途運輸，但因為早早失去爸爸的庇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5期(2018)

佑，缺少良好的教育，可說出口成「髒」。他們的命運都烙有深刻的時代悲劇感，而我自動「下放」布里斯本市昆士蘭大學，也和動盪的時局有關。

**YW：**這些年，移步於北美、澳洲、香港、台灣等地，遠遠近近、裡裡外外、東西交融地換著觀看中國大陸，您看到了什麼？形成怎樣的「中國大陸觀」？

**LC：**兩岸三地或大中華都是「想像共同體」(Anderson, 2006)，六歲多時我離開大陸，在台灣成長，一直到讀完研究院才赴美留學，共住了近20年，在香港居住、工作則近31年，對兩岸三地有著深厚的感情，三地的治亂、進退都能牽動我的心弦。我非常慶幸，能利用香江的特殊位置，為兩岸的新聞傳播學術界做了點橋樑的工作。

文化上的不同，刺激了實踐和思考，也促成學理發揮。在各校任教，我差不多都教傳媒理論、比較傳媒制度、國際傳播、中國大陸傳媒發展等課。與各地及大陸的同行交往，對我的教學和研究啟發很大，但我發現不少華人傳播學者似乎有些焦慮，希望能盡速迎頭趕上先進國家傳播研究的水準，在全球學術論壇爭取話語權。而大陸同行的焦慮又似乎遠遠濃於台灣與香港的學者，我想這和大陸的傳播研究起步較晚，又受到政治和意識型態的干擾有關。相比之下，台灣和香港的學術沒受到什麼干擾，發展較為平順，與外界接觸頻繁而多元，自信也就稍強、焦慮較少。學術發展有其自然「規律」，急只會揠苗助長、欲速不達，尊重科學求真的原則、少說多做與埋頭苦幹才是務實之道。

## 「我在傳播研究中發現中國大陸」

**YW：**能談談您的研究是如何起步的嗎？

**LC：**夏威夷東西方研究中心傳播研究所是我獨立研究的起點，*Planned Birth Campaigns in China: 1949-1976* (《中國計劃生育運動：1949-1976》)就是在那裡完成的。

**YW：**為何選擇從1949到1976年這個時間段？研究發現了一個怎樣的中國大陸？

YC：當時的西方學界很重視人口問題，早在1959年，傳播學者貝勒森(Bernard Berelson)認為傳播研究沒前途，轉向了人口研究。1968年，他在台北出席人口學的會議，我邀他到政治大學談談他捨傳播而研究人口的心路歷程，他婉拒了。我1974年在東西方中心時，尚無大陸人口計劃生育宣傳的專門研究，我的這本書主要探討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來的人口政策和計劃生育宣傳。至於1976年的選擇，很簡單，就是因為我完成修改的那一年就是1976年。書是1977年出版的，我寫到1976年已是極限，中國之後就翻天覆地變了，這年截止是必要，也是巧合。研究發現，中國大陸的計劃生育宣傳是單向的、控制的，技術性和執行性很強，不是自上而下的說服傳播，更不是自下而上的參與性傳播。

YW：這本書改寫自您的學位論文嗎？

LC：不是，我在台灣政治大學新聞所的碩士論文是《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之研究》，介紹該委員會的組織和職責，後來由教育部文化局出版。我在美國南伊大碩士論文用複迴歸分析中國學生的自我形象和美國形象，博士論文用結構功能分析研究大陸的農業創新傳播。

YW：您的博士論文 *Words into Plowshares: Communication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in China* (《化語為犁：中國的農業創新傳播》) 已經完成30年了，這題目今天看來依然「性感」。話語怎麼會「化」成犁？

LC：“Beating Sword into Plowshare” (鑄劍為犁) 是前蘇聯送給聯合國成立時的雕塑藝術，安放在聯合國紐約總部院子裡，這句話有點像「化干戈為玉帛」的成語，我靈機一動，去掉首字母“S”，變成“Words into Plowshares” (化語為犁)。化「語」為「犁」，隱喻中共宣傳模式之下，以語言來形塑國家動員的「大躍進」、「農業學大寨」等農業創新傳播現象。我通過對《人民日報》的研究揭示，「典型報導」其實是假典型，「批評與自我批評」其實是「批判與自我批判」，也是假的，「調查研究」則是為合理化典型或為批判服務。換言之，農業創新傳播只能跟著既定的政策走，無法改正錯誤，這是令人痛心的發現，也不同于當時美國一些人口學家的看法。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5期(2018)

**YW:** 您在美國求學期間所做的研究，無論是人口宣傳、留學生形象還是農業創新傳播均與中國大陸息息相關，對中國大陸傳播現象特別感興趣，這是為什麼？

**LC:** 當然是因為中國大陸傳播現象對於整個傳播研究很有意義和價值，何況中國大陸本身既重要、又有趣，而且夠複雜。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我初來乍到香港中文大學，正逢大陸剛剛從「文化大革命」的瘋狂中甦醒過來，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無不百廢待舉。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下，中國開始「半信半疑」、「半推半就」地向外看，也向內引。由於地緣與文化的接近，香港近百年來都是西方觀看中國的窗口，此時更自然而然地再次成為中國向外看的第一扇門窗。因了地利之便，我主編的 *The Asian Messenger* (《傳播季報》) 報導大陸傳媒動向，因此頗受讀者青睞。我個人也加深了對處在巨變中的多難中國的認識，興趣至今近40年未休。

**YW:** 我還發現，無論是人口宣傳、留學生形象還是農業創新傳播，均為效果研究。

**LC:** 沒錯，我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求學的時候，「效果」幾乎主導了大眾傳播的研究，無論是暴力、色情、政治、商業、內容的影響等等，又往往只將「效果」狹窄地界定為行為或態度的改變，這當然是不足夠的。現在，教學、研究的範疇廣多了，從微觀的個人行為到中觀的組織結構到宏觀的意識形態等等都成了研究的對象。但整體而言，主流的研究仍是效果，雖然定義在變，也比較多元，但工具性的思考和微觀的個體研究似乎仍然主導了美國的新聞傳播教研，歐洲的情況則要好些。

近20年來，新聞傳播教研內容最大的變動應是理論和方法的內涵愈來愈多元，也愈成熟、充實。在1970年代初，傳播研究才開始茁壯，當時南伊利諾大學的課程以「新聞」為主導，理論課較薄弱，有些同學捨新聞傳播改攻政治學。在圖書館裡，在書店裡，新聞、傳播理論的書籍少之又少，這在八十年代後逐漸起了變化，心理學、政治學和歷史學外，社會學、語言學、文化研究等都先後用來分析研究新聞傳播現象，書多了，學術刊物也多



了，多到根本看不完，跟不上。我認為研究效果沒問題，但不可簡單、狹窄地界定效果。

儘管相關學術成果多如牛毛，但其中三地比較的研究仍然很少，坦白說，我如果不在大陸出生、台灣長大、香港工作，我也不可能研究三地的傳媒和互動。我在陸台港三地以及澳洲移動的經歷，開闊了我的視野，使我關心台灣，又關心大陸，又關心香港，又關心澳洲，這四個地方我都關心。

**YW：您如何指導學生做中國大陸傳媒研究？**

LC：在香港、澳洲或台灣，指導碩博士學生做研究，不論是外籍生還是本地生，我都不會替他們選題，更不會替他們決定資料搜集或研究的方法，因為學生要養成自己思考、決定的習慣，這樣他們的進展可能較慢，但學到的東西會更扎實、更多、更久。一般而言，他們所研究的課題往往和我前面所說的相近，只要能回答所提出的問題，量化或質化的方法和分析，或兩者並用，都是好的研究方法。例如，曾有位博士生研究《南方周末》的內容如何打擦邊球，和中共宣傳部門捉迷藏。內容分析外，這位同學還訪問了曾在《南方周末》服務過的部門主管，歸納出不少忠於事實而不得罪當道的處理新聞策略。這位同學的方法既是量化的，也是質化的，它既是歷史的，也是現況的。還有位外籍生搜集一些新聞個案，發現網路既是突破中共當局新聞封鎖的渠道，也是中共當局探索民隱和解決或壓制民意的重要管道。換言之，網路是雙面刃的，它既能突破官方的新聞封鎖，也能為官方所用，成為監控社會和輿情的耳目。

不論研究什麼，我都提醒自己，也提醒同學，要忠於事實，要獨立思考，絕不可隨波逐流。不少海外研究文革時期傳播的論著錯得離譜，都和緊跟主流或當權者、先有結論答案、再找證據有關。倒是那些當年飽受批評的研究觀察正確，沒出什麼錯，因為他們的結論由資料歸納而來，不是找資料印證假設。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5期(2018)

## 「不應該存在理想教學模式」

**YW:** 前面您提到，朱謙教授啟發您認識到社會學對傳播學研究的重要。這種啟蒙式的影響是否也已滲透進您的教學中？

**LC:** 當然。我這學期在政大教「兩岸三地傳媒」課，就是從歷史和社會學著手，教學生要避開「媒介中心主義」，引導學生「以社會看媒介」、而非「在媒介看媒介」。因為今天的傳媒必定從昔日的傳媒演化而來，知道過去有助於認識現在，面向未來。傳媒和社會是互動的，兩者交互影響，不可能，也不應該分開來瞭解。我提出了一個宏觀的比較框架，由傳媒的意識形態、結構和運作等方面來比較三地傳媒的常與變，用英文說就是瞭解三地傳媒的 *continuity and change* 或 *constants and variables*。我認為掌握這些重點遠比記憶細節重要，因為訊息的細節經常在變，網上和圖書館裡的資料可說比比皆是，取得容易，同學們可以自行閱讀，用不著我於課堂重複。

目前看，兩岸三地傳媒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清末和民初，甚至在香港和台灣成為英國與日本殖民地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三地傳媒和受眾都只關心中國這個「想像共同體」，對英國與日本殖民地的關心反而變得次要、消極。不論多窮、多亂、多落後或多獨裁，這個中國都是三地人民，尤其是精英們，和傳媒的共同關注對象。當然，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和日本殖民地的台灣，這種想像是受壓制的，是暗多於明的。三地形成三種不同的政經體系和想像，則是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出現的。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前，三地傳媒謾罵多過交往，互疑多過互信。1980年左右，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三地各自為政，甚至相互為敵的情況才逐漸改變。我認為這段歷史很重要，而且延伸至今尚未停止，傳媒也深受其影響，不應該不談。

我教兩岸三地傳媒，還強調要避免本位主義，批判三地也就是自我批判。批判會令我們不舒服，但不舒服卻可令我們反思、改革，並且邁步向前。當然，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主觀、背景，我也不例外，但我不保留，告訴同學我的過去和現在以及對未來的想像，我不可能完全正確，但是我必定坦誠。我想，這也很重要。

美國芝加哥學派的的農村社會學家Robert E. Park研究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的一城一報，認為報紙是talk of the town，為市民提供話題。美國和澳洲都是大國，但人民有共同的話題，所喜惡的人、事相近，因此，疆域雖廣，人口多元，但還是一國。歐洲則不然，面積可能和美、澳相去無幾，但話題則以國家、語言劃分。兩岸三地的未來，也取決於能否建立共同的話題，這和通俗文化和傳媒所扮演的角色是分不開的。但話題的形成應該是自然的，任何權力的操控只會揠苗助長，產生反效果。因此，我要求同學們從宏觀的思維去比較三地的傳媒，看新聞，看溝通，看核心思想，看結構，看運作，也看變與不變、變得快或是慢。這些辯證思維，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也非常有趣。我也鼓勵同學參與、交流，介紹三地的新聞傳媒內容和通俗文化。新聞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一個地方上層社會的活動和看法，但通俗文化或娛樂則反映的是民間的生活和想法；在我看來，通俗文化的影響比新聞還深、還大，我們實在不應忽略。

另外，可能你也已經注意到，我幾乎每次上課都會一口氣講三小時故事，邊講邊掉書袋、開書單，徐徐展開不同地區的政治、經濟、歷史背景，試圖再現出不同時空的傳媒如何契合進不同政經結構的社會脈絡中。

**YW :**作為課上學生，我很認同您這種史觀和社會學取徑的課程理念，也很享受您有厚度、有氣度、有溫度的家國故事講述。您為什麼要採取敘事授課法？

**LC :**我採取敘事授課法，是因為課程的厚度和長度，會因知識的容量、以及教師的學養和閱歷而變。我講故事，抖笑話，滿足自己的傾訴慾，也可以有效防止你們打瞌睡。

在所有敘事中，我特別注重「社會學」和「史」的敘事，也經常給你們推薦各種有關三地的非虛構故事(non-fiction)書目。我重視「社會」，因為人在變，社會在變，傳播方式在變，傳播理論也必須要跟著變。「變」是「不變」的真理。人和社會永遠需要傳播，其中有更多奧妙等待我們去探索，傳播這門學科的迷人之處在於此，採用社會學取徑也和此有關。我重視「歷史」，是因為我覺得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5期(2018)

學術的標準界定整體上更嚴謹了，但或多或少忽略了「史」觀的培養和陶冶，這可從「歷史」在傳播院系課程和研究中所佔的份量日趨勢萎看出來。少了歷史的角度，新聞傳播的教學和研究質量都有不足，我們的思想、研究和認知便可能欠缺深度。

在上課時，我特別注重經過多番分析、論證後萃取得到的好的傳播理論。有些老師喜歡一上課就講理論，我卻相反，我把理論放在最後講，因為我相信瞭解內涵有助於瞭解理論，而且我怕一上來就講理論，會嚇跑學生，也會嚇到我自己。我最後講的理論也很簡單，就是「地緣政治」影響下的傳媒。香港過去的宗主國是英國，如今換成中國。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英國太遠啦，香港人關心女皇嗎？當然不關心，山高皇帝遠。可是現在，大陸這麼近，制度又和香港不同，就容易有摩擦，有矛盾。英國過去也曾想給香港民主，但是大陸不答應。所以，地緣政治的觀點就是，越近，影響越大；制度越不同，影響越大。

另一個問題就是，一國兩制成不成？成，也不成。理論上，這個構思有缺陷。成，人家會說，你看，中共不插手，香港就不變；敗，人家會說，你看，只要中共一碰，香港就變了。不同人的觀點也不同，大陸人會覺得香港人依然有自由，依然可以罵政府；香港人則未必有同感，以前罵大陸政府或北京當局不會被抓，現在罵可能遭受壓力或被抓。所以，一國兩制的實質是命運共同體，大陸開放，則香港開放；大陸有民主自由，則香港就有民主自由。台灣的情況也類似，地緣政治同樣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現狀和瞭解未來。

宣偉伯說大學應該是“where ideas crack”（思想碰得吱吱叫的地方）。勒溫（Kurt Lewin）說“Nothing is more practical than a good theory”（好理論最實用），如果你們上了我的「兩岸三地傳媒」課，會被地緣政治理論「碰得吱吱叫」，能讓古今中外其他相關的經典和理論「碰得吱吱叫」，能活學活用地將理論聯繫到當下和本土，進而體會到「好理論最實用」，我會開心地笑出來。

**YW：**這門「兩岸三地傳媒」課是您之前所教「中國大陸傳媒」的升級版嗎？

LC：可以這麼說，因為海外興起教中國傳媒，和中國的改革開放分不開，兩岸三地的交往也和大陸對外開放分不開。中國不再像文化大革命時期閉關自守，而且在過去十年已成為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一個重要部分，和三地及國際的交往也逐年增加、擴大，海外有需要多瞭解中國，三地也需要互相瞭解，而傳媒只是瞭解快速變遷中的一個面相罷了。

我在香港和台灣都教與「中國大陸傳媒」內容相近的課，選修學生則從四、五人到數十人不等。1978年，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就開了中國大陸傳媒的課程。當時第一屆的四名碩士生非選不可，但後來修課人數則多達二、三十人。早期「中國大陸傳媒」開課的艱難之處在於沒有材料，因為當時都是文革遺留下來的東西，而且中國大陸管控非常緊。這時期的課名叫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Chinese Societies* (中國社會的傳播模式)，這課名有點「掛羊頭賣狗肉」，因為沒有材料，中文材料更少得可怕，為了找備課材料，當時我經常光顧香港的左派書局，我的美籍助理 Sheri Tillman 就警告我說：「Leonard，你就不想回台灣，不想去美國了嗎？中央情報局就在書店對面拍你哦！」其實，她說的現象是六十年代香港發生文革式暴動時的情形，我1975年加入中文大學時，香港和大陸都開始在變。到了1980年代，我發現左派書局裡的大陸出版品，不管是數量還是種類都慢慢多起來了。

在台灣政治大學的國際傳播英語碩士課程，我還教 *International Images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 (國際形象與國際溝通) 等課，裡面也經常講到 China。我的看法也不是美國罵中國或中國罵美國那麼簡單，而是探討現象背後的歷史和社會因素。大陸有本書叫《妖魔化中國的背後》，我1997年在美國馬里蘭大學參加研討會，我演講的題目是〈《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的背後〉，講述在美國的中國形象背後的道理。我認為，醜是互認的鏡像，中國覺得美國醜，美國一定也覺得中國醜，反感是相互的。另一方面，審美觀感往往伴隨著利害關係或利益衝突，譬如西歐對中國印象就不是太正面，但是非洲和中、南美洲跟中國關係就不錯，因為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5期(2018)

中國有經濟為後盾，有可能逐漸取代令他們不喜歡的美國。

我在澳洲開 *Comparative Media Systems* (比較媒介制度) 課，中國是其中一個大單元。選修人數最多達兩百多人，好多來自外系。我不點名，也不可能點名。絕對有人蹺課，絕對有人打瞌睡，我用笑話來吸引他們。在政大，有個學期的第一堂課，三十多位研究生「擠擠」一室，連座位都不夠，我問學生為何來，他們回答“*We are your fans*”(我們是您的粉絲)。第二堂課一看，「粉絲」幾乎走了三分二，從此我就再也不敢問「同學們你們為什麼來」這個問題了。一般第一堂課，尤其是人多的第一堂課，我都會凶一點。人少的話，則會多笑一點。

**YW:** 您在2016年度中華傳播學會年會召集和主持「在大學開『中國大陸傳媒』課」專題座談，與同行切磋教學心得，是否達成教學範式上的共識？

**LC:** 通過這次有意義的專題座談，我知道個別同行是從政治切入教中國傳媒，討論新聞自由之有無及演進。我是從社會學及歷史取徑、引導學生觀察大陸、香港、台灣的新聞和傳媒，我在政大教「兩岸三地傳媒」，會啟發學生理解“*Taiwan's KMT and China's CCP differ in degree, not in kind*”(台灣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區別僅在於程度不同，而非類別不同)，而現在則是“*Taiwan's KMT and China's CCP differ in kind*”(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差異在於類別不同)，這表示台灣有了根本的變化。在昆士蘭大學教「比較媒介制度」，我的課只能講兩個禮拜的中國傳媒，因為我還得講其他各國。

人文和社會的教學本就是多元的，不應該只有單一的教學範式，中國傳媒的教學也一樣。各地的需求不同，每家大學的定位不同，學生的背景不同，任課教師的專長和經歷未必相似，教學內容相異，教法多元，可說再自然不過。兩岸三地的傳媒不但龐雜，而且多變，無論師生多麼賣力，永遠都教不完、學不完，掌握重點和激發興趣與思考非常重要，而這也是我設計課程時的首要考慮。



## 「我講授地緣政治，也享受有緣人生」

**YW:** 您教過香港學生，教過澳洲學生，教過台灣學生，也教過三地的國際學生。您如何克服不同國籍學生之間的文化差異？如何因材施教？

**LC:** 我覺得因材施教最重要莫過於尊重差異，但也發掘不同學生的共性。首先，你得尊重學生，他們來自五湖四海，膚色、種族、宗教、信仰、政治各不相同，你不知道自己無意間說的哪句話會觸犯哪條禁忌，傷害哪種政治或文化背景之下的學生。因此，無論在哪兒，我盡量只說有把握的反話，絕不說帶種族或文化意涵的玩笑話，最大程度地避免誤會和過度解讀。

我教過最認真的學生是位德國人，她永遠準時，從不遲到，作業寫得整整齊齊，期末報告厚厚一迭，非常扎實。人家就是「當回事」，人家做什麼事都那麼專業，讓你沒法不給她最高分！

我也教過不怎樣的學生，剛開學時的這位學生的作業裡錯別字和語法錯誤一堆，期末報告卻完美得驚人。這不正常！我打開電腦，輸入關鍵詞檢索，發現檢索結果的當頭第一篇就跟他的完全雷同。我給他的評語是“*You plagiarized even the punctuations*”（你連標點符號都是抄襲的），毫不猶豫地給了他「鴨蛋」、「當」了他（註：「當」是台灣的俚語，音同「當舖」的「當」，不及格之意），因為我認為寫得不好是學習過程可能會出現的現象，可以理解，但抄襲則絕不可原諒。

我接觸過的大陸學生大都很聰明，基礎知識很扎實，但也較封閉。好在大陸學生知道自己來自較封閉的體系，他們反而對外界的看法充滿探索的好奇心。大陸勝在人口眾多，只要更開放、自由，只要有5%的年輕人是優秀的，發展前途就不可限量。因為，僅僅這5%的絕對數，就已經超過台灣和香港的人口總和了。

我整體上有個感覺，外籍生對中國傳媒的興趣遠比香港或台灣的學生為大，而台灣同學的興趣最小。這種觀察在我的台灣教學經驗中得到印證。在台灣政治大學給國傳碩士生和亞太博士生上 *Mainland China Communication Studies*、*International Images*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5期(2018)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等全英文課程，我發現國際學生比台灣本地學生更好奇去比較大中華地區的大陸、香港和台灣的異同。澳洲人是比較有國際觀的，相比之下，台灣不太有國際觀。台灣連「台灣觀」都沒有，大概只有「台北觀」，也可能有「鳳梨酥觀」。

在一個全球化和中國崛起的時代，太過「內視」絕非好現象。如果說大陸是「封閉型的封閉」，台灣和香港則是「開放型的封閉」。陸、港、台互不理解，甚至互相歧視，這很不幸，很庸俗，很糟糕，因為瞭解是最起碼的生存策略和溝通前提。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的黃成炬教授在中華傳播學會2016年會的與談中所說，我們不可以不理解我們的鄰居，不可以不理解這個世界。不理解他們，怎麼與他們交往？

學生的文化和知識背景不同，學習能力有異，我都可理解、包容，但抄襲絕不容忍，我要同學尊重事實和獨立思考則是一致的。

**YW:** 您說這應該是您人生中最後一堂課了，我和同學們很不捨。我們完全記不清在課堂上因您的幽默一起笑過多少次？因您的深刻一起沉思過多少次？因您的博學一起延伸出多少待讀書單？這些問題，恐怕只有我們教室所在的新聞館三樓的牆能回答——如果牆能說話的話。

**LC:** 相聚是緣分。我講授地緣政治，也享受有緣人生。人生百歲，不過一個「緣」字。對我而言，三種「緣」份影響了我。一是「時緣」，是我生長的兵荒馬亂年代。二是「地緣」，是我們全家在戰亂的「時緣」倒逼之下，經歷了「八萬里路雲和月」的顛沛流離，之後抵達的香港、台灣、美國、澳洲等地，這些「地緣」定位了我體驗人生的特定緯度。三是「學緣」，是我遇到的學人和學養賦予我看世界的獨特方式。

老師與學生在時空中的某一點相遇，在課堂上相遇，是「學緣」之一種。我還有個重要的「學緣」和「兩岸三地傳媒」這門課的直接關聯並不強，我就未曾在課堂上提及，那就是啟蒙我治學之道的「三加一」本書。它們教會我從社會理解傳播以及以傳播發展國家，對我影響至深。它們分別是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傳統社會的消逝：中東的現代化》) (Lerner, 1958)、*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大眾傳播與國家發展》) (Schramm, 1965) 及 *Communication of Innovations: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 (《創新傳散：一種跨文化的方法》) (Rogers, 1971)。「加一」指 *Achieving Society* (《成就社會》) (McClelland, 1967) 這本書，我說「加一」，因為提到這本書的人較少。如果我當年沒有讀到這「三加一」，沒有遇到宣偉伯教授和朱謙教授，沒有耳濡目染過社會學和歷史學思考取徑，而只是遇到我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擅長量化方法研究政治傳播的艾爾文 (L. Erwin Atwood) 教授，那麼，也許今天的我會把這門「兩岸三地傳媒」課上成完全不同的模樣，更不可能宏觀地審視、理解變動不止的現象。

感謝你們，耐心聽我在課上「胡言亂語」。我說話雖幽默，但語重心長。中國的分裂，帝國主義者最開心，漁翁得利也，但我希望中國能統一在一個尊重人權的開明政府之下。目前不易做到，但一步步穩步向前則是必要的。當下，維持現狀，各自埋頭苦幹，則必有這一天。

**YW：**有生之年在您的課裡相遇，擁有共同理想，確實是流星一樣珍貴的緣分。朱老師，再次謝謝您接受我的訪問。祝您健康！

**LC：**我可能得食言，會繼續再有「最後一課」。事實上，我早已不止一次食言，每次都以為自己「不會再上」，結果卻總是「再上一次」。這是因為我擋不住教學的魅力，教學的樂趣令我欲罷不能。無論如何，謝謝你訪問我，也祝你健康、進步。

## 對談中提及的著作

- Anderson, B.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Books.
- Chu, L. L. (1977). *Planned birth campaigns in China: 1949–1976*.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 Chu, L. L. (1985). *Words into plowshares: Communication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arbondale,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5期(2018)

- Lerner, D.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Glencoe, New York: Free Press.
- McClelland, D. C. (1967). *Achieving socie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Rogers, E. M., & Shoemaker, F. F. (1971). *Communication of innovations: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 Glencoe, New York: Free Press.
- Schramm, W. (1965).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 朱立著作選

- 朱立 (2008)。〈中國新聞媒體的常與變〉，《台大新聞論壇》，第7期，頁101–107。
- 陳家樂、朱立 (2008)。《無主之城——香港電影中的九七回顧與港人認同》。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 Chu, L. L.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China. In S. N. Paul Lee (Ed.), *Telecommunications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pp. 89–110). Cresskill,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 Chu, L. L., & Lee, S. N. Paul. (1995).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Hong Kong: Transition, adaptation, survival.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 1–17.
- Lee, S. N. Paul, & Chu, L. L. (1995). Hong Kong media system in transition: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 90–107.
- Chu, L. L. (1994).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hina's media refor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4(3), 4–21.
- 朱立、陳韜文編 (1992)。《傳播與社會發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
- Chu, L. L. (1986). Revolution becomes evolution: China's communication across 30 years. *Media Development*, 1, 8–12. (UK)
- Chu, L. L. (1985). An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Some generalizations, hypotheses and questions for research. *Gazette*, 35(3), 3–18.
- Chu, G. C. & Chu, L. L. (1981). Parties in conflict: Letters to the editor of the *People's Dail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4), 74–91.
- Chu, L. L. (1978). Sabres and swords for the Chinese children: Revolutionary children's songs. In G. C. Chu (Ed.), *Popular media in China* (pp. 16–51).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本文引用格式

- 王彥 (編) (2018)。〈中國大陸傳播的教學與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5期，頁1–18。